

[法] 伯德莱 著 耿 昇 译

清宫洋画家

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在清代，在皇宫与民间、油墨与水彩、东方与西方之间，行走着一群洋画家，他们成为皇宫里的座上宾，身穿绫罗绣彩的中国官服，都有着一个中国名字：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璋、贺清泰等。他们的身份独特，地位显赫，其画作融纤毫毕现和意境高远于一体……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清宫洋画家

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法] 伯德莱 著

耿 昇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宫洋画家 / [法] 伯德莱著; 耿昇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218-11015-8

I. ①清… II. ①伯… ②耿… ①画家-生平事迹-世界-近代 ②耶稣会-传教士-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IV. ①K815.72 ②B97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2992 号

QINGGONG YANG HUAJIA

清宫洋画家

[法] 伯德莱 著 耿 昇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陈其伟

装帧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1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80517 83793157

序言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胆敢冒犯孔子，这正是我在本篇简短的序言中所要做的事。

1932年于巴黎，我是吉雅尔（Giard）老师的一名不惹人注意的神职人员，他是一名拍卖估价员，整年在德鲁奥（Drouot）饭店成批成批地出售书籍。他的主要合伙人是乔治·安德里厄（Georges Andrieux）。后者是一位专家型学者和滑稽可笑的人，即第三共和国一位著名省长的公子哥，也是阿拉贡（Aragon）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称呼我为其“无名教士”，从而向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至于我本人，我高高地坐在讲台上，被挤在书籍推销员和略有点耳聋的自修室出纳员之间。我“拿着那些标签”，用一只呆滞的眼睛凝视着大厅，那些风雅的业余艺术家和旧货商们，也并排站立在那里。

在这个时代，唯有东方和远东的书籍之出售，才会使我感兴趣。我曾多次得以以低价（我当时只有22岁）采购到有关来自亚洲的最早发现的原装古旧书，如《东印度史论集》，它的作者是为曼恩（Maine）大公效力的苏许·德·勒内佛尔（Souchu de Bennefor）、由东印度公司和联合省（荷兰）派向日本天皇的那些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使节、由彼埃·德·高耶（Pierre de Coyer）和雅克·德·凯塞（Jacob de Keyser）大公派向中国皇帝的使节。此处还有某些不那么古老的书籍，如马戛尔尼（Macartney）的跟班仆人安德松（Anderson）的回忆录，约翰·巴罗（John Barrov）的中国中原和鞑靼地区旅行记，马戛尔尼的旅行记，夏庞蒂埃—科西尼



(Charpertier-Cossigny) 的广东行记等。某一天，一名专门破坏艺术品之徒，毫不犹豫地将他个人的看法，用铅笔笺注于某几卷书的边缘。我曾得以获得整整一批 26 册书，用浅黄褐色的皮子装订，系由外国传教区所写的《教化人的和趣味书简集》（即《耶稣会士书简集》——译者），由图鲁兹（Toulouse）的克里斯蒂安·桑（Christian Sans）出版社于 1811 年出版。它们变成了我的本义和转义上的床头书了。^① 在阅读它们时，我便产生了对于耶稣会士们的兴趣。耶稣会士们都是一些超群的佼佼者，也是为信仰和政治而冒险的人物、艺术家和宗教信徒，他们冒着风暴和受迫害的危险，而在整个亚洲布道。依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曾叮咛其弟子们说：“去吧！去照亮全世界吧！”

我从青年时代起，便完全不是如同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那样，将注意力集中于美洲，而是将视野转向了远东。我于 1945 年之后，每当情况允许时，便乘货轮出发，远涉重洋去到远东。我对于东南亚仅仅是走马观花地瞥了一眼，从而激励我几乎每年都要重返那里一次。理所当然，我自己也曾多次前去中国中原、台湾地区和日本，并对那里着迷了。在台北，我“结识了”绘制依纳爵像的大画家——当时尚不太著名的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我的妻子与我，我们于 1971 年联袂写了一部有关此人的图文并茂的专著。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何连贵先生的殷勤帮助下完成的。因为郎士宁的许多画，都得以在从 1860 年和 1900 年那令人无法饶恕的抢劫中，被抢救出来了。

相反，尽管我于 1970 年专程赴北京旅行，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所以我未获得故宫博物院藏郎士宁绘画的照片底版。

^① 我要指出《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一种再版本：《1702—1776 年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附有大事年表、导言和注释，由 J·微席叶和 J·L·微席叶刊行，卡尔尼埃·佛拉玛里雍出版社 1979 年版。

鉴于这一事实，我于25年之后，便偶发奇想，想写一部有关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画家们的尽可能臻于完善的研究论著，并且要利用人们可以在该世纪末所能觅得的全部新资料。

这样一来，我便沿着不同的渠道，在一种猎人本能的驱使下，在我于本卷书应该感谢的那些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逐件地搜集汇总了一大批照片资料。如果我说它们是很理想的，那恐怕是有点自吹自擂，但它可以使本项研究的面目焕然一新。

为了赋予本书某种程度的完整统一，我将意大利人郎士宁和同样也为画家中的佼佼者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作为排头兵。当然还包括那些技艺超人的工程师，诸如“大水法”（喷泉）的设计人蒋友仁（Michel Benoît），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非耶稣会士的神父与修士们，诸如马国贤（M. Ripa）神父和遣使会（味增爵会）会士德理格（Pedrini）神父。

我在北京发现了几幅郎士宁和王致诚时代的绘画。我于此特别向杨邦达先生表示谢意。在柏林，有几幅于热河完成的小画像，在多勒（Dole），有青年时代王致诚的几幅小开本绘画。最近，出于一次始料不及的机遇，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在奥尔良（Orléans）共同重新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战争史纲》。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无法找到它，它也不为人所知。它很可能是受归化的教徒高类思和杨德望的作品，他们在法国大臣贝尔坦（H. Bertin）的鼓动下，曾在法国度过数年。他们得以确认《乾隆皇帝得胜图》中的不同版画，因为他们认为其中叙述的事件（1753—1760）相对较晚，而且还借助于钱德明（Amiot）神父书简以及与自中国归来的方德望（Lefèvre）神父的谈话录为佐证。在天津大学的最后一种发现应归功于我的日本朋友熊泽那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他为我获得了由王致诚和郎士宁寄出的那些作为《乾隆皇帝得胜图》图案的草图，它们可能为法国版画家们提供了样本，这些图案图画可能是在大革命期间遗失的。



即将到达哥林纳达海岸的一艘耶稣会士船的船首。油画，18 世纪初叶（波哥大国家博物馆藏）

当郎士宁和王致诚修士于18世纪初叶来到北京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耶稣会实际上是于1534年在蒙玛尔特尔（Montmartre），由依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创建。它很快便于1540年获得了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的承认，教皇还曾鼓励过该修会的活动。

罗耀拉的第一弟子或信徒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Xavier）。此人于1552年12月，在登上中国广东一个小岛上川岛时逝世。其实那里距广州只有数十海里之遥了，基本上处于他梦寐以求地想进入的那个中国的门户，甚至是处于能听到其声音的范围内。米尔肖尔·努内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z Barreto）是于1555年在广州定居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但仅有两年而已。他后来被迫退居澳门，由于当时澳门是唯一向欧洲人开放的中国港口，因而它后来也变成了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大本营。耶稣会士们在澳门修建了一座教堂、一家医院和一所东方语言（包括汉语在内）学校。事实上，在30多年间，耶稣会士们便这样停留在中国边界上，而无法在北京立足，布道团从澳门出发而分别赴印度、中国内地、暹罗（Siam）、交州（东京湾）和日本。从1558年起，便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Ruggieri），这是两名意大利耶稣会士神父，但他们却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区。他们都很有学问，同时享有举世无双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舆地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尊号，而且都成功地被广州接纳下来了。他们首先采用了佛教僧侣们的那种橘黄色的袈裟。但由于他们很快便理解到，这样做会将他们的身价贬低到一种屈辱的落魄地位，所以入华耶稣会士们很快便将袈裟换成丝绸服装，既很文雅考究而又衣冠楚楚，穿戴成中国文士们的样子，乘轿子出行。有一个非常滑稽可笑的细节，他们炫耀“一绺一直垂到腰带部的长须髯。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大的奇迹”[详见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的说法]；耶稣会士们在向中国官吏们传授其主要是天文学和舆地学的知识时，便逐渐地吸引了



他们。事实上，正如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cuture）于其有关耶稣会的大型传记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利玛窦绝不会忘记，主要是科学，是西方科学才可以吸引中国人，才会为西洋人的文明昭雪，并由此而提醒那些熟悉底细的人，产生受基督宗教归化的想法。”

利玛窦在罗马时曾是“近代欧几里得”克利维尤斯（Clavius，中国人称之为丁先生）的出蓝高足。他曾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其科学思想与一种神奇的记忆力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得以在一个月期间便令人神秘莫测地学会了汉语。

正是由于“西方工艺”的礼品，即诸如一架自鸣钟、一台羽管键琴，特别是其新全舆图，利玛窦才成功地一直接触到了北京朝廷中的万历皇帝。他的地图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可算是很详细的了，很巧妙地将所谓“中央帝国”——中国置于了世界的中央，从而大大地取悦了万历皇帝，赢得了其浩荡皇恩。皇帝最终于1601年把他召进北京，留在自己身边陪王伴驾。万历皇帝甚至令人建造了一座钟楼，利玛窦是唯一一个能够很好地调节该钟的人。此外，利玛窦还用汉文撰写了有关基督教与儒教的著作，他经常表现出同意儒教的观点：“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利玛窦归化了几位大文豪或文士。中国人围绕着他们其中之一徐光启（Paul Siu）而大批集聚了起来，如倪雅古（Jacques Niva），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此人是助理修士，也是天才画家，并且可能曾以其师利玛窦的名义而为某些宗教画署名题款。1615年，据统计，在中国有300多座天主教教堂。利玛窦逝世时，其继任者龙华民（Longobardi）神父派遣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父赴罗马，以介绍其师的光辉成就，同时也是为了获许在宗教礼仪中使用汉文汉语，从而有利于使中国文士领洗。罗马不仅给予了特许，而且还很注重派遣既是学者又是天才艺术家的耶稣会士们先后入华。

在他们之中，利玛窦最赫赫有名的继承人是汤若望（Adam Schall）神父。他是一位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生于科伦，曾与开普勒（Kepler）有交往，因受中国针对外国人的教案之牵连，而被困于澳门六年。由于他是学有所成的语言学家，所以他有机会变成一名出类拔萃的汉学家。他于1620年末由邓玉函（Terrentius，即 Schreck）神父陪同而进京，后来曾修订过中国历书。汤若望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做中国皇帝的顾问，从而使中国皇帝避免了北方的一场战争。他同样也传授铸炮技术，这些炮后来被皇帝命名……

从这个时代直到1645年，在明王朝崩溃之后，中国的基督教化或福音化过程最为热烈。天朝帝国的所有省份都设有教堂，唯独云南例外。但也正是在此时，爆发了可悲的“礼仪之争”。

置身于中国南方的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们，对于耶稣会的成功颇感嫉妒，由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从文化上与中国融合，所以他们对于看到耶稣会士们享有外国人（中国人）的名字并穿戴华服儒冠，惊讶得目瞪口呆。在他们的心目中，容忍尊孔礼仪以及向灵牌前的亡故者祭献供品的殡葬礼仪，^①便是最严重的事情。耶稣会士们声称这些都是“传统和民事礼仪”，而那些严守教规的清教派人士反驳说：“这是异端和向世俗屈服。”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教廷犹豫不决，颁布了多道教皇谕旨，同时又向生活在中国皇帝身边的几名耶稣会士作出种种相反的保证。当时不应该是展开争论的好时机，因为对基督徒的仇教教案成了明朝末年的标志（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缢而死）。这期间发生了王朝的鼎革，满族夺取政权建立清王朝。明代文士们的消失也缩减了传教区，传教区只能指望和依靠汤若望了，他始终远离纠纷并始终普遍受崇拜和景仰。

① 我根本不可能用几行文字来总结一个诸如“礼仪之争”那样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这场争论包括三大主要问题，而且初看起来也似乎并非是不可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名称来称呼“上帝”，第二个问题是祭祖礼仪是否与基督教规水火不相容，第三个问题是信徒是否可以参加尊孔礼仪。



汤若望出任一品官，同时兼任钦天监监正，也是年轻的满族皇帝顺治的“尊敬的神父”。顺治皇帝接受了在北京创建一座教堂的要求，但他却英年早逝了，继任其皇位的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皇帝——康熙。康熙登基时只是 10 岁的稚童，满族摄政大臣们又重操仇教之旧业。1665 年，汤若望遭到囚禁并被判处死刑，他得以活下来，完全归功于他预测到的一次彗星之出现，同样也归功于皇太后的干预。汤若望的健康被牢狱之灾彻底摧垮了！次年逝世。但他在钦天监和北京观象台中的继承人是一名中国人，此人很快就表现得不称职，瞬间又由一名耶稣会士取而代之，这位耶稣会士便是南怀仁（Verbiest）神父，他也出任中国朝廷的官吏。南怀仁不停地设法让中国释放仍被拘禁的耶稣会士，但也包括方济各会士和多名多明我会士。这后一些人一旦获得自由，便故技重演，立即重新向教皇揭露南怀仁神父居官及其所谓的有害施政行为，但南怀仁却获得了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教皇的支持。

康熙皇帝从 14 岁起便决定亲政。他天资聪慧并富有好奇心，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的觉，却用三个小时学习数学和科学，他对这些学科已经很精通了。他禁止耶稣会士们发展其布道热忱，但却赐予了他们浩荡的皇恩，他已无法离开他们的效力了。

应南怀仁的要求，在华耶稣会士们于 1678 年向欧洲耶稣会士们发出了一次呼吁：“请向我们派些学者、哲学家、音乐家和画家来吧！”法国特别是利用“海神”号船（L'Amphitrite，“安菲特利特”号）的远航而派去了一批耶稣会士。其中有张诚（Gerbillon），他曾代表中国皇帝参加与俄罗斯就西伯利亚之划界而在尼布楚举行的谈判；另有李明（Le Comte）、白晋（Bouvet）和巴多明（Parenin）。巴多明可能是成了中国封建君主的心腹，皇帝每天都与他高谈阔论科学与宗教，编制了有关中国中原与满洲的那幅著名的《耶稣会士大地图》。1699 年，经同一艘船又去了卫嘉禄（Belleville）神父，他是雕刻家、建筑家和细密画家；同去的还有一名世俗画

家格拉迪尼（Gherardini，年修士），他曾以油画的形式绘制了多幅皇帝的画像。在这些影响之下，康熙皇帝准予基督徒们自由布教。但罗马却越来越敌视耶稣会士们了，于是便派遣铎罗（de 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以便向中国的基督徒们重申他们对教皇应尽的义务并放弃祭祖礼仪。康熙皇帝对于那些他认为干涉自己内政的事端，



东方珐琅质盘，18 世纪，中间载有耶稣会的符号（起首字母交织图案，耶稣、人类和救世主）（巴黎私藏）

勃然大怒，先将铎罗投入了天牢，然后于 1705 年把他驱逐出内地。铎罗 1710 年在澳门死于由葡萄牙人看守的一间牢房中。巴多明^①成功地维持了与康熙的继承人雍正的友谊，但已播下了祸根，信任的基础被永远地摧毁了。中国的精英们终于理解，接受归化便是向西方的霸权敞开大门。中国皇帝 1724 和 1732 年的诏令禁废基督教，将所有传教士都先放逐到广州，然后驱至澳门，唯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神父们才例外地幸免于劫难。

乾隆皇帝于 1735 年继任其父雍正的皇位，他当时已是一个 27 岁的青年人了。该皇帝是一名伟大的中国文豪，因而对于基督教教义感到了某种真正的不信任，始终禁止向中国人传播这种教义。他于 1745 年发动打洋教事件并引发了一场教案，但他为宫中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修持他们宗教的自由。因为康熙皇帝高度地评价了耶稣会士们，认为他们是博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舆地学家、建筑学家、钟表匠、工程师，特别是艺术家。在那些画家中，意大利

^① 伏尔泰认为，巴多明神父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最聪明的人士”。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敌意，至少我们可以说，伏尔泰曾与耶稣会对立。



人郎士宁附属于葡萄牙传教区，是其中最受尊重的一员，也是被传入宫中的佼佼者。他当时年已 50 岁，在北京已经生活 20 年了。王致诚和潘廷璋（Panzi）继任了他。

在继续深入研究时，我不得不指出，被启蒙时代人士理想化了的 18 世纪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之形象，该有多大的差异啊！当时中国已经僵化，鄙视贸易、利润和国际交流，并且拒绝接受外国的发明创造（中国的骑兵依然以弓箭相武装）。中国在他们的发明中本来是超前西方数世纪，^① 18 世纪的中国却在沉睡中，并不再希望前进发展。这其中的最大罪人便是当时的天子乾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却是一个保守派（而且是在该词最具贬义上的“保守派”）。他将外国使节视为“入朝进贡的藩部使节”，并且于其一生的下半部分让其宠臣和珅专权，和珅贪图权势和金钱，而和珅本人又受宫中太监阉党们操纵。按照耶稣会士们的说法，这些太监们都为“不蓄胡须的人”。

希望这本微不足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画家的小书，能成为向“这些人”（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们）所表达的一种公正敬意，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人都不了起，他们身陷困难的环境中，却完成了大量工作，同时学习汉文和满文、从事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纪年、完成译著……而同时又未忘记他们的布道使命和宗教义务。”我无法找到更好的结论了，只好引证一名我于数年前曾请教过的外国耶稣会士神父的话：“我们违心地犯了宗教罪孽，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在时间上过分超前了，我们提前成了现代人。”

① 请参阅李约瑟（Joseph Needham）那些用英文发表的杰出著作，其中有些已经被译成法文，收入《中国与西方》一书中，1973 年版。

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使用马胸铠甲、带金属底座的犁铧、播种的耩、以铁冶钢等技术。此外，他们还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纸张（纸币）和火药。

目录

序 言	001
第一章 郎士宁的青年时代，加入耶稣会和入华旅行	001
郎士宁的旅行	005
郎士宁在北京	009
郎士宁与雍正皇帝	014
第二章 “诞生于调色板与画笔之间”的王致诚	021
王致诚的意大利之行（1725 年左右）	023
王致诚在阿维尼翁的初修（1735 年 7 月 31 日—1737 年 7 月 31 日）	034
王致诚的赴华旅行	036
王致诚从广州到北京	040
王致诚进入乾隆宫廷	043
第三章 大收藏家乾隆皇帝的耶稣会士合作者	049
第四章 康熙皇帝宫中的遣使会士德理格	060
第五章 大清皇帝巡视鞑靼——热河，木兰秋狝，王致诚拒官	067
乾隆木兰秋狝	079
王致诚被封官	081
第六章 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泰，《乾隆皇帝得胜图》 版画的绘制人	085
第七章 变成“大水法”专家的天文学家——蒋友仁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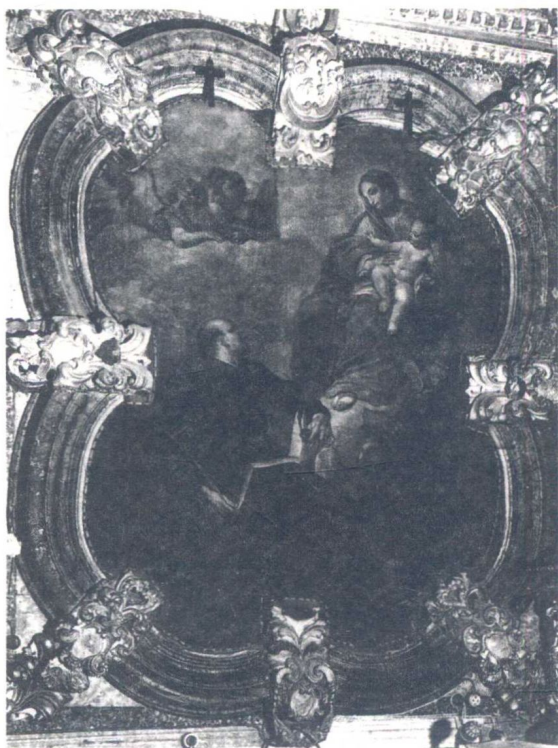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由耶稣会士主持建造的圆明园西洋楼	106
第九章	高类思和杨德望，路易十五派向中国朝廷的特使	122
第十章	肖像画家、花草画家、动物画家耶稣会士以及中国人的评论	128
第十一章	郎士宁于 1766 年逝世，王致诚于 1768 年逝世， 耶稣会被解散	141
	王致诚逝世于 1768 年	145
	耶稣会的解散	149
第十二章	清朝统治末年宫中的几位前耶稣会士	153
第十三章	耶稣会士与瓷器，所谓的“耶稣会士们的瓷器” ...	163
	郎士宁的瓷器	170
第十四章	耶稣会士画家在清宫的历史背景	173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过程	173
	二、法国北京传教区的创始	196
	三、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工艺和科技的调查	216
	四、18 世纪某些入华耶稣会士和宗教人物小传	242
译后记		252

第一章 郎士宁的青年时代， 加入耶稣会和入华旅行

郎士宁于1688年7月9日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后来成了18世纪中国宫廷中最大的御用洋画家。

我们对于其家庭及其童年时代，所知甚少。他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可能在当地的一家画室学习过绘画技艺。1707年，他在19岁时于热那亚（Gênes）加入耶稣会，并且在该会中进入初修。无论宗教义务具有多大的强制性，它们也丝毫不会阻止他发挥其光芒四射的艺术才能。他于1707和1708年为热那亚见习修士教堂绘制了两幅画，这两幅作品于1961年由乔治·洛埃尔（George Loehr）发现，它们代表着圣·依纳爵生平中的两个小插曲：《圣·依纳爵在曼雷萨的山洞中》和《基督显现在圣·依纳爵面前》。它们表现了一种缩影、透视和构图的绘画技术。这是一种学术性的绘画，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不仅仅是安德拉·波茨措（Andréa Pozzo），而且还有17世纪初叶的意大利的大师们的模糊影响：在乌云的一个裂口处出现了神祇，姿态各异和面庞露出悲怆之情。这确实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那种枯燥乏味的艺术。安德拉·波茨措是这种“维持原状”（无混乱）的意大利著名透视画和逼真画的大名家。人们曾不无些许恶意地声称，波茨措根据耶稣会的箴言，而使天堂坠落到了“临近伟大的天主”之地约20米处了。

郎士宁继其初修之后，便前往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耶稣会修道院。事实上，在18世纪初叶，葡萄牙人被剥夺了他们



圣·依纳爵生平的片断画，装饰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医院的古小教堂。油画，由郎士宁于1707—1708年绘制